



晚清人才地理分布 研究(1840—1912)

A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Tal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40-1912)

王继平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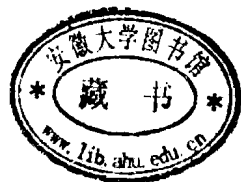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晚清人才地理分布 研究(1840—1912)

A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Tal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王继平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1840—1912)/王继平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004-9895-7

I. ①晚… II. ①王… III. ①人才—地理分布—研究—
中国—清后期 IV. ①C96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9562 号

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1840—1912) 王继平等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6(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7 插 页 2

字 数 658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进士的籍贯分布与分流	(1)
一 晚清科举制度的演变	(1)
二 晚清进士的籍贯分布	(12)
三 晚清进士的仕进	(107)
四 晚清进士的分流	(129)
第二章 晚清政治领袖的区域分布	(139)
一 晚清督抚籍贯分布	(139)
二 晚清政治改良与革命人物区域分布	(168)
三 晚清会党农民领袖区域分布	(190)
四 晚清政治运动的地缘色彩	(219)
第三章 晚清军事人物地理分布	(225)
一 晚清军制的变迁	(225)
二 晚清将军、提督、总兵籍贯分布	(232)
三 晚清团练将领籍贯分布	(250)
四 晚清新军将领籍贯分布	(260)
第四章 晚清企业家地域分布	(273)
一 晚清近代企业的兴起与发展	(273)
二 晚清买办的地域分布	(284)
三 晚清官办企业负责人的地域分布	(308)
四 晚清私营企业主的地域分布	(323)
第五章 晚清学术人物的地理分布	(348)
一 晚清经学家的地区分布	(348)

2 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1840—1912)

二	晚清文学家的地区分布	(358)
三	晚清教育家的地区分布	(380)
四	晚清科学家地区的分布	(391)
五	晚清学术的区域特色	(399)
第六章	晚清留学生区域分布	(403)
一	晚清留学运动的展开	(403)
二	晚清留日学生的籍贯分布	(418)
三	晚清留美学生的籍贯分布	(421)
四	晚清留欧学生的籍贯分布	(432)
五	晚清留学生地域分布分析	(451)
第七章	晚清驻外使领馆籍贯分布	(461)
一	从天朝到列国:晚清外交的建立(1840—1911)	(461)
二	晚清驻外使领馆籍贯分布	(486)
三	晚清驻外使领馆籍贯分布原因分析	(500)
四	晚清驻外使领馆与区域风气	(513)
第八章	晚清文化地理变迁	(525)
一	晚清传统教育机构的地域分布	(525)
二	晚清新式学堂的地域分布	(533)
三	晚清新式报刊的地域分布	(545)
四	晚清新式知识分子的地域分布	(563)
参考文献		(572)
后记		(587)

第一章 晚清进士的籍贯分布与分流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①我国自行科举制度以来，进士一科就成为士大夫们极力追求的目标，而当历代王朝统治殆危时，如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无不更加重视科举以笼络士人，风雨飘摇中的晚清亦不例外。科举取士，三年一度中试的进士成为国家人才的精英，也是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关系着清王朝的治乱和兴衰。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清末，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这场“旷古未有之奇变”中，晚清科举制度的演变以及进士的籍贯分布、仕进和分流，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研究晚清进士群体、科举制度，对由此推知各地经济、文风的高下，分析各地人才的兴衰，探讨晚清人才分布规律及人文地理都有积极意义。

一 晚清科举制度的演变

产生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确立于唐，发展于宋，衰亡于明清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300多年，它是封建王朝设科招考选拔官僚人才和士人“投牒自进”挤入仕途之道的以考试为核心的选士制度，是中国古代用人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飞跃。

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统治者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经历了从西周的世袭世禄制到秦朝的军功封爵制、两汉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科举制才应运而生。它通过考试的方式，凭文取人，使人才选拔有了客观的标准和衡量的依据，也使选官用人有了制度性的保障。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考，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②的自由报

① 王栻：《严复集》（一）之《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② 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考原则,除了娼、优、隶、卒等“贱民”外,其他人皆可参加科举考试。这扩大了应试者的范围,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机会,体现出一种开放、平等精神。为了确保这种形式上的公正平等,科举取士本着“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原则,公开竞争,择优录取。政府还制定了一整套详尽而又严密的考试规则,以防止越轨行为,如锁院以防漏题、搜检以防夹带、监考以防偷看、糊名誉录以防关节、内外帘之隔以防串通作弊、场后复试以防冒名顶替、考官回避制度以防徇私舞弊等等。^① 科举制度在形式上的这种平等、公正性,给每一朝为“田舍郎”送去了“暮登天子堂”的幻想,为草野寒峻之士开辟了登进之途,在很大程度上使封建政权不断开放,并有效地吸纳着社会文化精英,激发着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使其能够利用科举之途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它适应了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因此能超越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并存在一千多年。

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定型为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形式以八股取士且具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②。三年大比,首先是童试,取中者为秀才。第二级为试于直省的乡试,中试者为举人。第三级为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取中后称贡士。正科会试逢丑、辰、未、戌等年,三年举行一次,每逢朝廷登基、大婚、大寿、国家大庆之年,可另加一科,称恩科。第四级为皇帝亲策于廷的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举行。殿试分三甲录取,取中后统称进士,一甲录取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清承明制,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发展到相当完备程度,但是,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自诞生之日起,人们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批判,行之既久,弊病日生,其弊端也越来越显露。洎乎清末,世变日亟,科举制度百弊丛生,积重难返。论者谓科举制度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吸收进入政权,造成人才流向的单一,以四书五经为主,以八股文取士的科目人才不足应时务。人们要求变革科举的呼声更加强烈,尽管清代统治者多次图谋改革科举,但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1905年9月清政府下诏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也即停止”^③。科举制度

① 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49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92页。

不得不走完其漫长的历程，变为历史的沉积。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科举改革思潮的酝酿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① 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原是国家选拔精英人才，保证社会阶层之间正常流动的机制，但由于科举与政治经济特权相关联、功名利禄的强大诱惑力，使神州大地成了科举赛场，士人们均吸引到这一狭窄的上升道，皓首穷经，覬覦一官。“窃计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以仕于朝，其额之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②。这种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随之带来不正常的科场作弊，久禁不绝，影响了竞争的公平原则，同时，由于科举从内容（指定的四书五经注本）到形式（八股）都极度僵化，使得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严重畸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③ 鸦片战争前夕，一些有识之士就对即将遭遇的新时代表示了强烈的预感，喊出了救世的心声，他们认识到科举制度非变不可，为此提出了种种变革主张。龚自珍主张科举考试应废除经义，效汉代“讽书射策”之法，改试策论，“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者摈之”^④。包世臣主张在考试内容上做些变动，“罢八股，以明经术、策时务二事应之”^⑤。王鼎认为“经义取士，其途稍狭，不能尽天下人才”，主张于进士科之外另设科目。王爵滋也提出：“特开一科，如从前诏举博学鸿词故事，第不试以诗赋，而试以策论，取其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用之；或兼设数科，如汉之经任博士，文任御史，才任巨县等目，分别试之。”^⑥ 这些主张虽没突破传统思想中那套老办法，但它们却在当时起着开山筚路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在侵略者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这些经过激烈的科举考试而选拔出来的社会精英在战争中的表现既可恶又拙劣，“文官怀印而逃，以投池为故套，武弁弃城而溃，以退守为自全，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之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23页。

③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十辑之《己亥杂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1页。

④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页。

⑤ 包世臣：《包世臣集》之《说储》，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136页。

⑥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问敌情则茫然无知，闻讹言则各自奔散”^①。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出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和一些科举人才的昏庸无能，人们纷纷倡言变革科举制度。

1841年两广总督祁贡上《请推广文武科试疏》，奏请改变考选制度，建议在科举考试中添加五道策问：“曰博通史鉴、曰精熟韬铃、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阴阳占候、曰熟谙舆图情形。”^②陈澧在考试内容上主张以九经试士，改变士有通五经之名而无通一经之实这种状况；在操作层面上主张分场筛选。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有识之士开始注意选拔造船制器的人才。魏源主张改革武试专以“弓马技勇”的取人制度，提出在“闽粤两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奇器者，为科甲出身”^③。冯桂芬主张在通商各口岸设船政局，聘请外国人教授工匠，如果工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④。

由于时代的局限，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所提出的变革设想大多是从传统寻求出路，试图采取传统的“药方”，来医治现时社会的弊病，主要侧重于对科举制度的修补，但魏源等人提出的以西学取才的设想从根本上动摇了科举制度，为近代科举改革指明了重要方向。然而，对于科举制度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历史状况，当时只是少数仁人志士的空谷足音，并没有成为普遍共识。战争的失败，也没有使冥顽腐朽的统治阶级抛却“天朝上国”的虚骄之情，思图改革。这一时期在有关国家考选制度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依旧是开科取士，程序也基本沿袭旧法，学校依旧是科举的附庸，科举仍为士子所趋鹜。

（二）洋务运动时期开专科、纳西学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内忧外患促使统治阶级中一批开明人士汇聚而成洋务派，掀起了向西方学习、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洋务派深感人才匮乏，纷纷上书请求变革科举。洋务巨擘李鸿章1864年首次向朝廷提出变更科举考试的问题。他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

① 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

③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9页。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1年版，第157—158页。

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① 这是从造就近代科技人才出发，主张把懂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纳入科举正途之中。1867年李鸿章代呈藩司丁日昌条款，主张对科举之制略作变通，除考传统科目外，再考算数格致、机器制作等，可惜的是，丁氏“条款”清廷拒绝采纳。与此同时，早期维新派也抨击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提出改革科举主张。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皆认为科举不能培养优秀人才，亟应变革。他们抨击科举之累，主张“于文武正科之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并指出这“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祖宗成法也”^②。在设计科举变革方案时，为弥补科举制度重才轻德的缺陷，大多主张恢复上古乡举里选之法，“欲士敦实行，莫若修荐举”^③。

在“中体西用”观念的指导下，洋务派小心谨慎地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862年，恭亲王等奏设同文馆，当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1866年又提议在其中添设算学馆。随后，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洋务学堂陆续出现，如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这些洋务学校开设了许多有关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方法，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士林新风气，加快了近代教育的改革步伐，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举制度的解体。

同治三年（1864），根据广东省奏定章程，总理衙门奏准“广东同文馆学生蔡锡勇作为监生，另三等五名作为翻译生员，准予一体乡试，分别派充将军、督抚各衙门翻译官”^④。四年后，总理衙门又批准上海同文馆“附生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北闱应付；监生汪凤藻、汪远焜、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⑤。这两项决定意味着科举生员的来源开始包括新式学堂，扩大了科举取士的途径，昭示着清代科举考试改革已迈出了前进的

① 宝璜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五），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1年版，第2494页。

②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3页。

④ 宝璜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1年版，第5261页。

⑤ 同上书，第5484—5485页。

步伐。

19世纪70年代后,一些洋务派代表主张把算学、洋学列入考试科目。1870年10月,沈葆楨、英桂联名奏请“特开算学一科”,1874年12月,李鸿章奏请在“科目”中废弃“小楷试帖”,同时“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一大批掌握“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①等知识的洋务人才。1875年礼部奏请在乡会试中增设算学科,但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双方为此唇枪舌剑,最后由总理衙门出面,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了结。总理衙门认为李鸿章“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②,决定科举暂不用增设科目,而洋务人才则通过荐举入仕。虽然艺学科或算学科之议被暂时搁置了,但改革科举的呼声却日益高涨。1882年侍郎宝廷奏请“特开一科,以算学考试”。次年御史陈启泰以“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为由,请“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无论举贡生监皆准赴考,试之以有用之学”^③。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提出“仿照翻译例,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④。1887年御史陈琬莹上《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疏》,主张改革乡会试之法,增加算学考试,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⑤,量予科甲出身。面对朝野上下一片强烈的科举改革呼声,又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1888年的戊子乡试中,第一次开设算学科,总理衙门对各省送到生监及国文馆共计32名学生试以算学题目,照章取中一名算学举人。算学科目的开设,是科举制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学同考。

新式学堂的兴起、新兴课程的设立,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教育体制,冲击着科举制度既定的法则,形势将古老的科举制度推到了一个被重新认定和选择的位置。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顽固派实力强大,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严重制约了西学输入的深度和广度,刚刚开始变动的中国社会还不能摆脱正统文化思想的束缚,洋务派对科举制度的改革还不能触动科举制度之根基。科举考试仍然名正言

①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③ 同上书,第223页。

④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⑤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8页。

顺地把持着考场重地，四书五经也未失去其正统地位，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这张无形之网中撕开了一道裂缝，为日后科举变革大潮的到来做好了铺垫。

（三）戊戌变法时期废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大清帝国竟被蕞尔小国日本所败，举国震惊。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群起，攘夺利权，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急速沉沦，维新派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戊戌思潮席卷而起，变革科举成了时代的召唤。朝野志士倡言改革，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①。八股首当其冲，被视做罪魁祸首，成为众矢之的。维新派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大声疾呼变革，加快了科举改革的步伐。

严复认为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因而须“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②。1898年6月，杨深秀奏请厘定文体，各项考试不得割裂经文命题。康有为呈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用策论折》，指出八股取士实质上是“愚民之术”，主张当务之急是变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并在《请开学校折》中建议光绪帝远效德国，近法日本，兴学校，育人才。梁启超认为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③，他联合在京应试举人，再次进行“公车上书”，请废八股，提议光绪“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④。

废除八股是铲除科举制度的一个旧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效仿康熙、乾隆年间举行博学鸿词科之意，设立经济专科，建议经济专科分六事取士，“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设立经济专科，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凡录用由于此科，皆比于正途出身”^⑤。此奏上后，光绪帝即行谕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1898年1月，总理

①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272页。

② 王栻：《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3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7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页。

⑤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02—103页。

衙门与礼部提出把经济专科分为特科和岁举,“先行特科,次行岁举”。特科考试的内容为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与考工六门,“或十年一举,或二十年一举,候旨遵行,不为常例”。常科则三年一举,“分场专考,首次场试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中试者名曰经济科贡士,亦一体复试、殿试、朝考等”。光绪帝认为“所议特科岁举两途,洵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著照所议准行”,特科“俟所保人员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①。同年4月,浙江巡抚廖寿丰上折建议经济岁科直接由学堂选举,不必试四书文。6月御史宋伯鲁奏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7月总理衙门会同礼部拟出特科章程六条呈览。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即照所请行”,并“著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于三月内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一次”^②。谕令颁发后,经济特科得旨允行,“天下人之心思耳目为之一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898年借变法之机,光绪帝首先拿科举制度开刀,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科举的诏书。6月11日下令迅速创办京师大学堂,23日诏令:“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③30日准奏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7月10日诏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和专门学校。不久又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为蓝本,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次序互易,“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且令“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④。8月19日上谕又明令废止朝考,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科举制的主要形式,如八股文、诗赋、小楷至此全部更改,但仍保留着四书五经的内容。

废八股、改试策论、经济特科的设立是对沿袭数百年八股取士制度的反叛,也是对八股士子的一次沉重打击,所以它自出现之始,就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与极力阻挠。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变法夭折。10月9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24—4026页。

② 同上书,第4128页。

③ 同上书,第4141页。

④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396页。

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①戊戌变法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开办外，科举改革刚刚起步即被扼杀，化为泡影。

（四）新政时期奖游学、递减科举中额至正式废除科举

1900年八国联军借镇压义和团之名对华发动大举侵略，京城陷落，西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次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为借科举考试笼络涣散的人心，清政府迫不及待地恢复被延误的科举考试。外国侵略者为了惩罚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毁坏教堂、杀害传教士地区的人民并防止反抗力量的复起，在《辛丑条约》中规定：“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考试。”^②根据条约被迫停止的省份，政府换了个地方举行，如直隶的乡试移往河南，山西的乡试挪到陕西。1901年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举行乡试，其他各省也于1902年次第举行，1903年、1904年清政府还举行了癸卯、甲辰科会试。

在惨遭八国联军的炮火洗劫之后，国势日益岌岌，清政府痛定思痛，力行改革。1901年西太后还在西安就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科举改革话题重被提上议事日程。

1901年4月，山东巡抚袁世凯上折建议按年逐减岁科、乡试的录取名额，增设实学一科。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疏，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的主张，科举考试“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③。两广总督陶模认为：“变法必自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今宜明降谕旨，立罢制义大卷白折等考试。”^④

为消除内忧外患的压力，表明“新政”之意，清政府不得不对早已成为众矢之的科举制度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实施部分改革。1901年8月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废除八股，各省科举改试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的“策论”；各省开设大、中、小学堂，学生毕业后可以取得功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20页。

② 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一），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915页。

④ 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第4148页。

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生也“一体考验奖励”。1902年12月清政府命以后新科进士一律入京师大学堂肄业，与此同时，还命政务处拟定经济特科考试章程，重开经济特科，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订立学堂章程。1903年7月10日，经济特科正式在保和殿开考，与试者186人，按规定考试分两场，第一场为正场，录取一等48人，二等79人，准予复试，但梁士诒、杨度等人被怀疑与维新党人有染而被除名，有的因卷中出现“卢骚”字样亦被除名。7月21日特科复试，草草了事，仅录取一等9名，二等18人，其余的皆被淘汰。

认识到科举有碍新式学堂的推广，1903年3月张之洞会同袁世凯再次奏请按年递减中额，渐行罢废科举，“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晋身之阶”^①。张、袁所奏之折，递进后交政务处议奏，未有复议。1904年1月在呈递《奏定学堂章程》时，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袂重申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的请求，建议“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②，直至科举完全废除。在《奏定学堂章程》中还专门列有《进士馆章程》，主张从制度上设立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每日讲堂功课四点钟，三年毕业”^③。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废除科举的决心，但最终批准递减科举中额。至此，科举取士实际已处于不废而自废的境地。1903、1904年举行癸卯、甲辰科会试，第一场改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仍试四书五经义，这两科形式上虽照旧，但考试试题一改以往僵化守旧的内容，开始关注现实有用的问题。进士馆也于1904年5月开馆。

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晚清士人，腐朽的专制统治大厦即将崩塌。为挽救清王朝，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上奏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学堂绝无大兴之望。”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④。奏请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999页。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1页。

③ 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

④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3—65页。

立停科举，以广学堂。此时的清朝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面对如此众多疆吏之坚请，这年9月2日清政府被迫下诏废除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①。至此，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科举制度通过清政府一纸诏书，在形式上废除了，但余响却如空谷足音，久久萦回。顽固势力为恢复科举仍摇旗呐喊，1907年候补内阁中书黄云藩、给事中李灼华还提请朝廷恢复旧日科举制度。而为了善后处理旧式士人及新学堂学生和留学生的出路问题，清政府在废除科举后继续实行生员考优拔贡和举贡考职，并对新学堂学生和留学生予以功名奖励，这一切都是科举制度的残余形态，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一切才都在激进的潮流中湮灭。

晚清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在急剧地不断发生着变化。虽然由于上层顽固守旧集团和社会惰性势力的拼死护卫，统治者长期用来选拔文官和进行思想统治的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制度，得以继续延持着，但在时代前进的大潮面前，它的腐朽落后越来越明显。综观整个晚清科举制度演变历程，从龚自珍等有识之士的批评科举、疾呼改革开始，继而有些督抚大员亦倡此议，到1905年的正式废除，这是一个长时段的、艰难反复的过程，走了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贯穿了整个晚清历史。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单纯是一个制度的存废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改变社会习俗，矫正社会心理等的问题。它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重大事件，不仅加剧了晚清的社会动荡，也加速了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②。科举的废除切断了以科举追求功名利禄的通道，迫使数以百万计的童生、士子涌进学堂去寻觅新的出路，新式学堂便雨后春笋般在华夏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活跃于历史舞台，成为清朝统治者无法控制的新生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92页。

② 王栻：《严复集》（一）之《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